

宁德畬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实践与启示

赖 扬 恩

宁德畬族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早期开展扶贫实践的地方。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促进了畬族地区现代转型,表现在:加快完善畬族地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建立了可持续的脱贫机制,为缩小民族之间差距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度、深度增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村民文化自觉增强,畬族区域文化多样性、生态多样性得以强化。宁德畬族扶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从中得出的启示是:注重畬汉共建全面小康,注重培育内生发展动力,是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注重引导畬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又注重民族政策的完善和创新,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关键词:宁德畬族扶贫 中华民族共同体 社会转型 民族政策

作者赖扬恩,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福州市,邮编 35002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①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虽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诸多原因,民族地区总体发展还滞后。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重点加强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持,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文通过对福建省宁德畬族地区扶贫开发的经验总结和实地调研,^②探讨从加快民族地区自身发展步伐,尤其是提升内生发展动力的角度出发,走具有区域特色、民族地区特点的科学发展路子,促进民族地区现代转型,对于完善民族政策、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取的宁德畬族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早期开展扶贫实践的地方,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促进了畬族地区现代转型,为新的民族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畬族地区民族关系朝着更高层次的有序化演变,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宁德畬族地区扶贫开发充分体现了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总体规划在实践层面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与维系,突显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可以说是各族人民共同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 页。

^② 笔者先后于 2015 年、2017 年多次实地调研宁德市霞浦县崇儒畬族乡,蕉城区金涵畬族乡、飞鸾镇,福安市穆云畬族乡、康厝畬族乡以及这 5 个乡镇所属的 21 个畬族村。

意识的一个缩影,可以为其他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参考。

一、宁德畬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实践历程

福建省的少数民族以畬族为主。自唐代中期至清代末期,畬族先民历经近千年的游耕迁徙,从闽、粤、赣交界处广袤山区聚居的族群,逐渐演变为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农耕民族,主要分布在福建宁德与浙江南部。宁德市现有畬族 18.9 万人,约占全省畬族的 1/2、全国畬族的 1/4,是全国畬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全市设 1 个畬族经济开发区、9 个畬族乡,共有 237 个畬族村。^① 宁德畬族大部分位于欠发达革命老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985 年宁德全区畬族贫困户高达 1.6 万户,占畬族总农户的 50%;《福建省民族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1988 年)表明,“闽东一带少数民族收入水平较低,人均纯收入在 200—300 元居多,少则只有 100 多元,这些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温饱问题无法解决”。^②

宁德畬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宁德畬族扶贫开发因地制宜迈出坚实步伐

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是这一时期扶贫战略的特点。1986 年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开始以区域为单位实施开发带动脱贫。宁德畬族扶贫始终秉承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致力“摆脱贫困”的思想精髓、倡导“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弱鸟先飞”的进取意识和“四下基层”的工作作风,发挥畬族“忠勇担当”“智慧勤劳”“不屈不挠”的优良传统,在此期间牢牢打下了扶贫开发的坚实基础。习近平同志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1988—1990 年),第一次调研活动就选在福安市甘棠镇过洋畬族村,此后在任上又陆续实施畬族“造福工程”、^③茅草房改造、“五通五改”等民生工程。他指出,“旧社会由于民族歧视,畬族都找那些偏僻边角的地方落脚,自然条件上首先就差了很多。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在现实工作中要解决这个问题”,“考虑闽东的脱贫问题不能不考虑畬族问题”。^④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他对加快民族地区繁荣发展、扶持畬族群众脱贫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双向开放”“双向开发”等系列工作思路。^⑤ 20 世纪 90 年代,宁德地委、行署始终把畬族乡村列为扶贫攻坚重点,加大对畬族地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文教卫生事业投入。据 1997 年统计,宁德全区“造福工程”中有 1942 户 10,258 名畬族村民搬迁到环境较好的地方定居,有 719 户 2859 名畬族村民完成茅草房改造,畬族乡村新建 62 个文化站、150 个医疗站。^⑥

(二)2000—2014 年宁德畬族扶贫开发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此阶段国家扶贫战略实施,着重鉴别、确定贫困村,帮扶乡村最低收入者。以实施《福建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为契机,采取挂钩帮扶、保护畬族传统文化、发展畬族特色经济等政策措施,确保加快发展。例如,2012 年福建省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帮扶民族乡加快发展五条措施》。宁德畬族扶贫形成了输血帮扶与造血帮扶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典型

① ⑤ 参见中共宁德市委统战部课题组:《新形势下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若干思考》,《调研文稿》第 9 期,2016 年 7 月 15 日。

② ④ ⑥ 参见宁德市民族宗教局:《宁德市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情况汇报》,2015 年。

③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宁德对一些基础差的贫困村、受灾村、草房村(户)实施搬迁。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倾力推动这项工程。这一为民惠民之举,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造福工程”。

带动与补足短板相结合、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的良好局面。主要做法有：

1. 对畬族贫困乡村采取重点挂钩扶贫方式。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大力倡导的,它一直是省、市贯彻党的民族工作方针的重要举措。自2003年开始,省直有关部门、沿海市(县)帮扶挂钩9个畬族乡,宁德市也建立了“两挂钩一扶持”制度。仅2012—2014年,省、市、县各挂钩单位共投入帮扶资金达1.1亿元,实施项目130多个,带动社会投资2亿元。^①

2. 加大畬族乡村“造福工程”搬迁力度,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通过集中安置、插花安置、梯度安置、进城安置和跨区域安置等形式,多渠道筹措资金,让搬迁村民真正“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1998—2014年,全市“造福工程”累计搬迁畬族村民达5.6万人,占畬族人口的26.7%,落实搬迁补助款2300万元。与此同时,按照“一乡一优势产业、一村一优势产品”的思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到2014年底全市畬族乡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232个。^②

(三)2015年以来宁德畬族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实施精准扶贫是国家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与脱贫攻坚现实需要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德市赤溪畬族村扶贫开发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③宁德市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为契机,注重城乡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协同,建立综合性贫困治理机制,促进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由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例如,实行精准扶贫“六到户”,即干部包户、龙头带动到户、造福搬迁到户、信贷扶持到户、能力培养到户、社会保障到户;实行精准扶贫“六到村”,即领导包村、资金项目扶持到村、扶持集体经济发展到村、农业龙头企业结对帮扶到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完善到村、党建扶持到村;实行精准扶贫“四到县”,即资金扶持到县、山海协作到县、交通改善到县、城镇化推进到县。截至2018年底,宁德市贫困发生率从2016年的3.2%降至万分一以下,尤其是深度贫困的畬族贫困人口脱贫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市58个畬族贫困村整体改变面貌,10,810名畬族贫困人口基本稳定脱贫。^④ 主要做法有:

1. 进行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实施分类开发。组织入户调查,对贫困对象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对贫困对象强化“一对一”指导帮扶,不搞政策“一刀切”。

2. 坚持资源开发与政策落实相结合,找准脱贫切入点。抓住政策落实的“窗口期”,统筹扶贫项目、资金、人力,扩大外界“输血”效应。扶持畬族乡村发展茶、果、蔬、水产等特色产业,增强畬族经济自主“造血”功能,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例如,崇儒畬族乡笪下村葡萄专业合作社,由101个畬族村民发起成立,初始阶段由省财政立项补助合作社资金80万元,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334亩,种植巨峰晚熟葡萄,每年产出鲜葡萄200多吨,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葡萄种植基地。

3. 强化畬族乡村精准扶贫的组织保证。注重建设“三支队伍”。第一,加强畬族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调打造一支能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永不离乡村的工作队伍。第二,加强扶贫工作队队伍建设,省、市两级实行下派干部驻村任第一支部书记,有33个畬族村被列为省、市两级整

① ② 参见宁德市民族宗教局:《宁德市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情况汇报》,2015年。

③ 参见王一彪、蒋升阳、赵鹏、李波:《脱贫路上的赤溪村》,人民网,2016年2月1日。

④ 参见赵巧红、张颖珍:《滴水穿石奔小康——写在寿宁、古田、屏南三县脱贫“摘帽”之际》,宁德网,2019年6月24日。

村推进帮扶对象,宁德市还向所有畲族贫困村派出一名以上驻村干部,铸牢带动脱贫的中坚力量。第三,加强畲族乡村实用技术人才建设,完善贫困群众培训帮扶政策,确实做到每个畲族贫困家庭至少有一名劳动力接受培训,并能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技能。

二、宁德畲族地区扶贫开发的特点与经验

宁德畲族扶贫的实质在于把贫困地区发展置于整体国家计划基础上,同时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基层工作人员不断创新,上下通力合作,完善发展资源运用的管道,体现了政府主导原则以及发展的计划性特点。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有利于把发展落实到解决区域性共同问题、促进民族团结上,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促进了畲族地区现代转型。

(一)从经济层面看扶贫开发对于畲族现代转型的促进

宁德畲族大都地处山地、丘陵地带,传统农耕是畲族最主要的生计来源,包括梯田型水稻耕作、定耕型旱地杂粮耕作。^①显然山区条件不利于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于中心地具有偏远性或边缘性。山区地势变化急剧性导致空间承载格局碎片化,无法进行规模布局与空间集聚,导致长期以来畲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在人地关系的冲突与适应过程中,畲族形成了显著的山地适应性,具有深厚的农耕传统与习俗。传统耕作收入并不足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须有一定的副业为补充,如将狩猎猎获品、木炭、柴草、扫帚、竹子、蓝靛、木材、药材、筐篚及蜂蜜、鱼、猪、鸡、鸭等作为小商品出售,以换回铁农具、盐、米等必需品。^②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民族之间经济交往日趋频繁,利益纽带和相互依存度增强,畲族与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分离性以及畲村无工业等滞后现象开始扭转,起初形成了“种田吃饭、打工挣钱”的畲族经济模式,当时学者将其归纳为:畲族村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仍处在自给阶段、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中青年的主要经济活动等。^③此后,随着扶贫开发的逐步推进,从经济层面看,畲族地区现代转型有了深入发展。

1. 扶贫开发将民族政策优惠照顾与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紧密结合,加快完善畲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实现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明显改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关系和文化逐步深入畲族地区,传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弱化,经济结构的重心逐渐从传统生计模式转向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各种产业。东南沿海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促使畲族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从封闭向开放转变,区域城乡关系逐渐从割裂向融合转化。例如,随着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外出打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就是畲族村民谋生的普遍现象。根据穆云畲族乡统计,全乡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所占比重,2000年为10.22%,2010年增至36.93%。^④从笔者2017年调研的21个畲族村来情况看,外出打工仍然是畲族村民的主要经济活动,多数家庭青年几乎都要外出打工(具体情况可参见表1),只有极少数畲族村本身处于宁德中心城区边上,如蕉城区的亭坪村,所在区域经济实体项目多,带动了村民就业,外出打工者比例较低。打工者外出的时间一般为半年,属“候鸟式”季节性打工,大体上是春耕农忙结束之后外出,农忙季节回到老家

① ② 参见施联朱、宇晓:《畲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

③ 参见龙远蔚:《关于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思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④ 参见蓝炯熹:《穆云畲族乡志》,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4年版,第120页。

耕种收获。也有常年在外打工的,多数还只是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边缘人。部分打工者赚到钱后,在城里买房定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回村里。例如,洋坪村 210 个外出务工者中,有将近 80 人在外面城镇买房定居。外出打工者主要从事石材加工、泥水工、木工、五金工以及建筑业、运输业等行当。有熟练技术的人打工范围广,除了到省内的福州、泉州等地,还有到北京、上海、湖北、新疆等外省(市),没熟练技术的人一般只在宁德市区或当地县城做临时工。

表 1 21 个畲族村村民外出务工情况统计表(2017 年)

乡(镇)	行政村	村人口数	外出务工村民数	外出务工村民所占比例
崇儒畲族乡	溪坪村	613	180	29.4%
	新村	806	320	39.7%
	霞坪村	535	110	20.6%
	上水村	762	330	43.3%
	笕下村	503	200	39.8%
金涵畲族乡	金峰村	900	250	27.8%
	院后村	498	150	30.1%
	亭坪村	935	30	3.2%
	中前村	728	180	24.7%
	上金贝村	327	90	27.5%
	琼堂村	1900	130	6.8%
飞鸾镇	向阳里村	608	360	59.2%
	南山村	686	130	18.9%
穆云畲族乡	虎头村	900	110	12.2%
	溪塔村	633	150	23.7%
	洋坪村	768	210	27.3%
	燕科村	916	210	22.9%
	科后村	340	80	23.5%
	王楼村	685	120	17.5%
康厝畲族乡	金斗洋村	1160	400	34.5%
	凤洋村	1400	430	30.7%

注:数据为笔者调研所得。

扶贫开发注重依托畲区资源禀赋,立足传统与现代整合,畲族原有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已从传统生存型农业向“专、精、优”的现代农业转型,确保了畲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也是宁德畲族地区脱真贫、真脱贫的内在动力所在。原有依靠“种田吃饭”的传统生存型农业,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单一种植业生产面临着自然灾害、疫病虫害等多重风险,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导致贫困人口收入难以提高。一方面,扶贫开发根据畲族的文化生态背景,因地制宜地发展多元生计模式,从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经营向以经济作物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转变。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能适应国内外多样化、优质化的市场需求,进而实现畲族村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另一方面,实施“畲族乡村特色经济发展扶持增收工程”,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重视“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发展(本文所调研的畲族乡村特色产业大体情况可见表 2),选择一批产品有特色、市场前景好的产业重点扶持,走产业支撑的开发式扶贫道路。

表2 畬族乡村特色产业基本情况表

	崇儒畬族乡	金涵畬族乡	穆云畬族乡	康厝畬族乡	飞鸾镇
特色农业	形成茶叶、绿竹、芙蓉李、高山晚熟葡萄、生猪、辣木等种养业为主的格局。专业化龙头企业有：东孚农庄、嵩峰科技、木茗草堂、永兴茶叶、万家福合作社、从农合作社等。	形成茶叶、果蔬、畜禽、水产、食用菌、花卉、中药材等26项37种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扶持院后三红蜜柚、毛竹高产垦复、蔡洋山闽东山羊、蕉城畬家黄兔、中闽山哈乌米饭等31家专业合作社，其中仅南阳公司畜牧业产值就突破10亿元。	形成茶叶、刺葡萄、穆阳水蜜桃、枇杷、杨梅、柑橘、毛竹、油茶、中药材等种植业为主的格局。专业化龙头企业有：溪塔刺葡萄、泽清茶叶、溪塔畬药生态园等42家专业合作社。	形成竹荪、黑木耳等食用菌、晚熟葡萄、百香果、蜜雪梨、红梨、寿桃、紫芭乐等台湾水果、肉鸡养殖、水牛养殖、闽东山羊、洋溪小种花生、高台生姜、茭白种植等为主的格局。专业化龙头企业有：健宝农业发展公司、彭洋晚熟葡萄园、杜家洋台湾水果种植、彭洋村利农水牛养殖、苏坂村本地山羊养殖、界竹村茭白种植等。	畬族主要分布在南山、向阳里等四个村。形成稻谷、茶叶、甘薯、毛竹、晚熟龙眼、荔枝、水蜜桃、蜜柚、反季节蔬菜种植等特色农业。专业化龙头企业有：南山水蜜桃、金桔蜜柚、畬药种植、向阳里牛羊养殖等4家专业合作社。
特色旅游业	古龙岩生态旅游、溪西水库生态旅游、樟坑蓝氏大厝民俗风情、畬族武术“盘柴槌”、传统畬族歌会等。	闽东畬族文化园，宁德工艺博览城，上金贝民族特色村寨，后溪传统村落，金峰美丽乡村等。	白云山世界地质公园、龙亭峡谷、穆阳溪景观、穆云畬乡生态旅游、虎头村民族特色村寨、溪塔葡萄沟、南山村民族特色村寨等。	金斗洋村、凤洋村民族特色村寨，金斗洋畬族拳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半山、竹沃等畬村“三月三”畬歌会。	白马山、凤凰山生态旅游，南山村特色畬寨旅游，南山“罗连调”对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畬族民歌传习点）等。

实践证明，围绕具有畬族资源优势的特色农业这个核心，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手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虽然多数规模较小，但大都具有市场需求，可以实现畬区脱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带动当地农民增收。目前在宁德畬族地区，福鼎的碇门、佳阳和霞浦的盐田畬族乡山上“绿色产业”、海上“蓝色产业”，福鼎的方家山白茶，霞浦的大坝雷竹、西胜晚熟葡萄，蕉城的上金贝特色村寨旅游、雷东水产，福安的溪塔刺葡萄、虎头水蜜桃、王楼立体农业，寿宁的坝头紫玉淮山等现代特色农业已成为畬族村民重要的增收手段，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加快。据统计，早在2014年全市9个畬族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279元，同期宁德市为11,302元、福建省为12,650元，呈现赶超发展态势。其中金涵、坂中、康厝、穆云、盐田、碇门、佳阳等7个畬族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过所在县(市、区)整体水平。^① 笔者调研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可参见表 3。

表 3 2016 年部分畬族乡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 单位:元

	院后村	亭坪村	上金贝村	琼堂村	南山村	虎头村	洋坪村	金斗洋村	金涵畬族乡	康厝畬族乡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600	15700	14800	13000	8900	19500	11000	14672	14374	15027

注:数据为笔者调研所得;宁德市为 13,516 元,福建省为 14,999 元。

2. 健全扶贫开发长效机制,构建“市、县、乡、村、户”各层面联动,“党委、政府、部门、社会”全方位发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扶贫开发格局。随着宁德市实施港口、产业、城市、生态“四位一体”联动发展,构建环三都澳区域发展战略的推进,畬族地区扭转了边缘性参与状况,更加主动地参与主流开发,逐步改变畬区经济落后状况。扶贫开发立足于推动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强化政府的经济互助功能,既将畬族经济转型纳入整体视野中,又对畬族发展进行重点倾斜,形成政府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可持续脱贫机制。

可以说,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过程就是把民族政策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发展优势的过程。省、市、县建立挂钩帮扶畬族乡村的机制,通过对口支援、横向经济联合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搬迁扶贫等,加快了畬族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二)从社会层面看扶贫开发对于畬族现代转型的促进

畬族长期与汉族杂居,畬汉互通有无、互补共生,历史上早已形成了相互关联补充的利益共同体。畬族村落一般都与汉族村落交错分布,既与汉族村落保持一定的距离,又相距不远,有些村落还逐渐变成了畬汉共居村落。^② 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巩固了民族之间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了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

1. 扶贫开发加快畬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扶贫开发有效促进了畬族地区交通、水利、信息、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例如,支持通乡镇、建制村公路升级改造,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网络建设,构建了安全、便捷的城乡出行服务体系。省道、县道、乡村道路和机耕路的建设,根本改变了畬族乡村原有步行、肩挑的运输模式。宁德市还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实施农村公路改建,例如,崇儒畬族乡中心到上水村的乡道改扩建项目,改善了公路沿线 5 个村约 1.5 万人的交通状况,也有利于保持上水村及周边畬族村民原有文化特性的社会生活。

扶贫开发加快畬族乡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消除民生建设上的短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历史上畬族教育较为落后,仅靠家庭教育与祠堂教育,畬族人口识字率低。目前宁德畬族地区,无论是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均已发生根本变化。宁德畬族地区还立足民族小学、民族中学平台,发展各类技术和职业教育,大大提高了畬族人口的文化素质。据统计,宁德已设置独立民族中学 6 所,设置民族小学 45 所,2000 年以来被高等院校录取的畬族大学生累计达 7000 多人。^③ 扶贫开发还着力改善畬族乡村医疗条件,实施“沿海

① ③ 参见宁德市民族宗教局:《宁德市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情况汇报》,2015 年。

② 参见施联朱、宇晓:《畬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福建论坛》1991 年第 1 期。

山区对口帮扶”工程,加强乡村医务人才队伍建设,消除医疗卫生服务空白村,实现了畲族乡村公共医疗全覆盖。

2. 扶贫开发加强民族之间社会流动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度、深度增强。民族间社会流动性增强,促进了畲族村民发展意识、开放意识、公民意识以及市场经济观念、法制观念等形成。由于历史上畲族长期的边缘化,畲族村民具有自卑与自尊共存的“族群”意识。随着扶贫开发的推进,畲族发展意识、公民意识得到明显强化,加快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成了畲族村民共同的愿望。此外,随着法制观念逐步确立,传统习惯法逐渐淡化,畲族村民普遍转向靠诉讼来解决各类纠纷矛盾。传统畲族邻里纠纷在宗族中调节,现在则是找村委会,大的经济民事纠纷则走司法渠道,畲族乡村治理体制正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随着扶贫开发的推进,畲族村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衣食住行变迁方面表现出衣着时尚化、饮食居住现代化、出行便捷化等普遍特征。传统的畲族服饰仅在祭祀、节庆、表演、走亲戚等民俗活动时使用。番薯仍是畲族村民的主食之一,但已逐渐转变为以大米为主,食品结构渐趋合理。畲族社会生活形态从封闭转向开放,还体现在具有多元的就业观念、自主的婚姻观念等方面。历史上畲族一般不与外族通婚,本民族异姓或同姓不同祠堂者方可通婚。现在畲族青年男女基本上都是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畲汉通婚已十分普遍。例如,崇儒畲族乡的新村有806人,改革开放以来娶进汉族女子约70人,嫁给汉族的畲族女子约60人。畲族村民不再固守狭隘的家园,积极拓展生产生活的地域空间,表现为具有民族身份的工人、农民以及新的社会阶层。青年一代逐步认同城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形成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逐步背离。外出打工的畲族村民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技术、增长了才干,促使其生活方式迅速发生现代变迁。

随着扶贫开发的推进,畲族地区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构保持稳定。例如,1990年崇儒畲族乡总户数5810户,总人口2.38万,2015年总户数6338户,总人口2.60万;2001年穆云畲族乡总人口2.64万,2012年总人口2.95万。^① 畲族乡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总体上仍维持传统的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血缘关系仍有极大的影响力。虽然传统宗族观念已淡化,但宗祠、房的组织还存在,村民社区归属感的维持仍需这些血缘组织的运转。此外,畲族地区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开展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切实保障社会公平。

(三)从文化层面看扶贫开发对于畲族现代转型的促进

畲族传统农耕经济、封闭的生活环境,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畲族传统文化,可概括为以祖宗崇拜和多神崇拜为主干的,以祖图和畲语畲歌为标识的,兼具自然价值与人文价值、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的区域民族文化。^② 一些传统文化要素早已失去了社会功能,^③在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中,许多文化要素未能进行价值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畲歌传人断层、畲族医药、武术、手工艺濒于失传等问题突出。宁德畲族扶贫开发,有利于发挥政府在加强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导性作用,促进畲族村民的文化自觉,进而在认同基础上自觉传承。

1. 发挥政府主导性作用,加强畲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畲族区域文化多样性、生态多样性得

^① 参见蓝炯焘:《穆云畲族乡志》,第123页。

^② 参见徐永志:《福建宁德畲族(聚居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调查报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③ 一些畲族传统技艺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典型的如畲民制作蓝靛。早在19世纪后,蓝靛随着洋靛的输入逐渐失传,畲民“家家种苧、户户织布”的习俗完全消失。再如,畲民的编织刺绣工艺也随着老年妇女的离世而难以传承,畲族流行的传统彩带也只作为文化遗产而收藏,并不具有大众消费的市场。

以强化。面对文化传承困境,政府发挥决策、组织、统筹的主导性作用,并协调其他各种力量形成保护合力。2004年宁德市启动畬族文化保护与发展工程,2011年以来福建省实施少数民族文化“双十一”繁荣发展工程,重点打造“三月三”畬族文化节等项目。尤其是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开发畬族乡村文化旅游项目,加大畬族文化产业扶持。畬族文化资源优势向特色产业转化,畬族茶叶、服装、银器、美食等产业得以发展,畬族文化产业已步入创意化的新阶段。注重保护畬族文化多样性,以推进畬区特色村寨建设为载体,建立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例如,2013年将崇儒畬族乡上水村列入畬区特色村寨建设,整体以博物馆的方式进行保护,获得国家级生态村称号。类似上水村的还有上金贝、溪塔、虎头、白露坑、赤溪等一批列入特色村寨试点的畬族村,它们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保护特色民居、培育特色产业、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团结进步“五位一体”发展上发挥示范作用。

2. 扶贫开发促进畬族村民文化自觉,提升了民族精神气质。畬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内生力量来自于村民本身的文化自我觉醒。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与现代生产力要求不相适应的消极要素。随着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传统的宗教神秘主义已淡化,世俗化逐渐成为主导趋向,取代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地位。传统“耐劳杂作、弗事商贾”、“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族群封闭心理逐渐破除,民族之间多维度地进行族群互动,村民在实践层面的文化自觉,构成了畬族社会转型的内在推动力。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各种风俗节庆得以保存,每年“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九月九”等传统节日,村民自发举行歌会等活动,畬汉群众共同参与,营造浓厚文化氛围。在“造福工程”搬迁后形成的畬族聚居地,已成为文化传承的新空间,基于原有共同体社会关系的延续,畬族村民之间食物分享、礼物流动、换工互助等传统习惯仍得以延续。政府还注重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闽东畬族博物馆、闽东畬族革命纪念馆、中华畬族宫等设施,全市畬族村级文化站增加到103个。编写《畬族文化简说》等民族学校课程,促进畬族语言、民歌、传统体育走进民族中小学课堂,加深畬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理解与认同。扶贫开发还进一步强调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建立文化传承与村民经济利益的联系,激发其对本民族文化的内在需求,而基于畬族文化传统与新获得的文化资本又可以进一步生产出多样化、地方化的畬族文化特色。

三、宁德畬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几点启示

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促进了宁德畬族地区现代转型,其整体过程实质就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程,是进一步改善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一) 宁德畬族扶贫实践,注重畬汉共建全面小康,注重培育内生发展动力,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各族人民共同的经济联系、经济生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步伐,确保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就指出,“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使他们赶上或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才能够解除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民族得到共同的繁荣”,“目前,全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已开始转移到少数民族地区。20世纪90年代,闽东畬族地区开始从解决温饱问题为重点的摆脱贫困时期,进入以经济开发和开放为重点的实现小康

时期”。^①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促进了宁德畲族地区现代转型,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是始终立足于畲汉各族共同发展,根本扭转了畲族地区发展差距拉大趋势,为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示范。宁德畲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依然保留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畲族村民的贫困面比较大,既是福建经济最不发达地区,也是全国18个连片贫困区之一,属于深度贫困地区。三十多年的扶贫开发立足于畲族地区发展落后的现实,把调节发展差距和利益关系作为民族关系建构的立足点,实施了一系列旨在调整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的规划和项目,大力支持畲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效促进了畲族社会现代转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有力支撑。尤其是在畲族地区实行整体性扶助与精准性扶贫,建立经济互助体制,完善发展成果共享机制,让畲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促进了整体畲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均衡与协调,有效培育相互依存、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肯定宁德赤溪畲族村的扶贫工作,^②强调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作为处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宁德畲族的发展变化轨迹,对内陆少数民族发展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

二是始终立足于提升内生发展动力,实现由“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根本转变。扶贫开发注重“扶志”“扶智”双管齐下,在发展中培育畲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十分强调“扶贫先扶志”,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和帮助,但国家的经济实力有限,闽东本身又是贫困地区,所以不可能有更多的外来力量来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和帮助的意义主要在于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③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德市注重立足畲族地区整体发展,坚持产业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无论是扶持特色产业发展、推进特色村寨建设,还是出台优惠政策,都始终围绕构筑畲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例如,伴随“互联网+”农业蓬勃发展,基于互联网应用的商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格局日渐形成,畲族村民可结合当地的原生优势,直接对接到新的零售网络。村民通过生产创造特色产品或服务,通过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大力培育畲族区域性的农业公共品牌。此外,畲族山区承载的生态系统,往往具有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强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行绿色发展。鉴于区域空间发展受到的诸多限制,宁德市立足畲族山区国土空间优化,建立了层级有序、协同协调、利益共享的区域发展共同体,带动畲族山区发展与区域发展同步互动互促、整体协调均衡,进一步凝聚了畲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 宁德畲族扶贫实践,注重引导畲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

如果说上述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是属于实践层面的构建,那么引导畲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则属于思想意识层面的构建。

一是注重增进畲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更好地

① 习近平:《摆脱贫困》,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② 主要指赤溪畲族村十年“输血”就地扶贫、十年“换血”搬迁扶贫、十年“造血”“旅游+产业”扶贫的成功经验。

③ 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19页。

实现畬汉各族大团结大进步。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保证。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就重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脱贫攻坚组织保证。他指出:“在指导思想、组织保证上使党组织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真正能站到前台,真正能居于‘第一线’,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各级党政领导要经常过问民族工作,行动上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对少数民族都要有适当的照顾。切实帮助少数民族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① 宁德畬族扶贫始终坚持“党建带扶贫、扶贫促党建”,把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作为扶贫的重要措施,促使党建优势转化为扶贫优势、党建活力转化为攻坚动力,畬族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不断增强。尤其是2012年以来,全省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把脱贫攻坚作为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困扰畬族群众多年的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通讯难、教育难、就医难等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通过畬汉各族共享发展,畬族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也普遍从内心增强了对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同时,注重引导畬族群众牢固树立国情意识与“家底”意识,切实增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认同,有效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

二是注重增进畬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更好地建设畬汉各族共有精神家园。扶贫开发进程中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加强历史与国情教育,使畬族群众加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在加强畬族传统文化继承和保护的同时,更为注重畬汉之间文化的互动性、联系性、共生性,大力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宁德畬族地区实现了多元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例如,每年“三月三”畬族传统节日活动,不但增进本民族成员情感的认同感,而且畬汉群众共同参与,营造了民族交往的浓厚氛围;尤其是福建省每年举办政府组织的“三月三”畬族文化节,通过畬汉各族文化相结合、畬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经济相结合、旅游娱乐与宣传教育相结合等形式,邀请海峡两岸各民族共同参与,更大范围地搭建了各民族沟通交流的平台,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认同。类似的平台还有每年一届的“中国·福安畬乡桃文化节”等。实践表明,在尊重民族之间的社会差异与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积极推动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共享文化建设,引导各族人民增进对中华文化认同,才能真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根基。

三是强调增强区域民族共同体特征,注重增进畬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必须正视民族特点的多样性,同时又增强民族地区的一致性。扶贫开发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强调畬汉各族之间内在联系以及互动中的共生关系,既强调畬族的特殊性,同时也重视区域内经济社会文化的共通性,既认同畬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更认同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在现实生活中既充分尊重每一个畬族群众在民族认同基础上产生的民族感情与民族意识,又注重培育他们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强调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总体做到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保持民族特性而不强化特性,在尊重畬族文化、风俗习惯的同时,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 宁德畬族扶贫实践,紧密围绕“两个共同”目标,注重民族政策的完善和创新,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党的民族政策是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是民族发展的保障。宁德畬族扶贫在紧密围绕

^① 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61、126页。

“两个共同”目标的同时,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情况,注重民族政策的完善和创新,及时满足民族地区实际发展需要。

一是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民族政策在缩小民族区域差距、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制度保障作用。宁德市历届党委、政府秉承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的扶贫思路,久久为功、滴水穿石,探索出一条脱贫攻坚的“宁德模式”。无论是实施挂钩帮扶制度,还是实施畲族村分类开发,都突出民族政策的真正落实,扩大外界“输血”效应。福建省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法规条例,不断加大对畲族地区差别化扶持政策的落实,使民族关系在市场经济整合功能的作用下,聚合得更为充分和紧密。尤其是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以及福建省的实施意见,这些政策措施是畲族扶贫开发最有力的保障。扶贫开发在发挥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建立了可持续的脱贫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为缩小民族之间差距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例如,20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曾重视通过山海协作促进山区发展,以消除连片贫困,并亲自促成福州与宁德两市间的对口协作;同时,福建省也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推进山海协作的若干意见》(2001年),通过财政、金融等具体的帮扶政策,大大加快了宁德畲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脱贫攻坚步伐。实践表明,国家实行的民族政策对推动落后民族地区发展意义重大,唯有通过帮助与扶持让民族地区快速发展起来,才能确保朝着“两个共同”目标迈进,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二是立足畲族社会转型实际,地方民族政策既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同时又不断完善创新,更好地适应畲族地区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政策运行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对民族政策的实施不断提出新要求。如原有针对民族地区的一些优惠政策,被国家的普惠性政策所抵消等。宁德畲族扶贫过程中,注重把党的民族政策同本地区实际密切结合,正确处理中央扶贫开发政策与地方配套政策的关系、综合性政策与专门性政策的关系、政策设计与政策落地的关系。实施中根据不同推进阶段出现的问题与任务,及时进行政策的更新调整,努力做到政策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使民族政策真正落实到村到户到人。如畲族扶贫改变了以往重视物质性帮助文化发展的传统,通过政策引导畲族文化创新,既鼓励畲族学习与掌握现代文化,又推动畲族传统文化形式与内容的全面创新。再如,在民生工程、环境保护等方面,倾向于应用区域性帮助政策来代替民族性帮助政策;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则倾向实行以民族划界的优惠扶持政策。地方民族政策的完善创新还表现在推进就业扶贫与金融扶持相结合,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与开展资产收益扶贫相结合,探索医疗保险精准扶贫机制,创新扶贫投入模式以提高资金使用精准性等方面。实践表明,民族政策只有不断完善创新,才能持续保证少数民族以平等的身份纳入国家现代化发展轨道,有效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责任编辑 马 骏〕